

論清代清詩選本的分期及其特徵*

王兵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亞洲語言文化學部

前言

在當代人選當代詩選本的範疇中，清人選清詩在數量上要遠遠大於前朝各代。流傳至今的唐人選唐詩和宋人選宋詩選本皆只有十餘種，¹元人選元詩更少，明人選明詩相對較多，現存近五十種。清人選清詩在數量上則佔有絕對優勢，據日本漢學家松村昂的統計，清詩選本就達一百三十八種，²《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共著錄三百五十種左右。筆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仔細翻檢《販書偶記》及《續編》、《四庫禁毀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目錄》、《清代禁書知見錄》等書目，共覓得現存的清人選清詩六百餘種，數量大大超過了清之前所有當代詩歌選本的總和。

大量清詩選本的出現是清代詩壇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總體而言，清人選清詩的特徵主要表現為數量眾多，體式多樣；名家名選與無名選本共存；全國性選本和地域選本均呈繁榮景象等。不過，由於清王朝有近三百年的歷史，在其從繁盛至於衰落的不同時期裏，清詩選本也相應地具有階段性的特點。

參照歷史學意義上的界定，同時結合清詩選本類型和批評意識的發展實際，本文將清詩選本分為四個時期，即初興期、繁盛期、轉型期和總結期：初興期以選家和選本中的詩家必須在清初生活過為上限，主要包括那些遺民選本和跨代選家，選本編刻的時間主要是從順治至康熙初期。一個最為顯著的劃分依據是其時大量遺民選本的出現或選本中遺民情緒的蔓延。繁盛期的時間主要限定在康熙中期至乾隆中

* 本文惠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編輯和評審專家的賜正，筆者在此深表謝忱。

¹ 參見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序〉，頁1-4；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目錄〉，頁1-4；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〇九〈藝文志八〉，頁5393-5411。

² 參見松村昂：《清詩總集131種解題》（大阪：中國文芸研究会，1989年），頁1-102。此書後來又於1991年以活頁形式進行了增訂，題目易為《清詩總集138種解題》。

期，此階段清詩選本的類型得到空前的發展，諸種選本類型均已完備。清詩選本的轉型期主要是從乾隆中後期一直延至道光後期，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案是此階段與繁盛期的分水嶺。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是地域選本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其他選本類型，成為清詩選本領域中最为亮麗的風景。自咸豐至宣統三年（1911）為清詩選本的總結期，這一階段相繼出現了《國朝正雅集》、《清詩鐸》以及《晚晴簃詩匯》等大型的清詩選本。需要說明的是，總結期選本的下限原則上是至宣統三年結束，但是一些晚清遺老在民國時期編輯的清詩選本也應涵括在內，然所選詩歌必須「以清代為斷」。³

清代清詩選本的初興期

編選同時代人詩歌選本的風氣，在明清之際就已經蔚然成風，錢价人在《今詩粹》中述及其時編刻選本的狀況：「近來詩人雲起，作者如林，選本亦富，見諸坊刻者，亡慮二十餘部。他如一郡專選，亦不下十餘種。或專稿，或數子合稿，或一時倡和成編者，又數十百家。以至一箋一帙，散珠屑玉，不可勝窮。」⁴即使將其中的合稿及唱和集子排除在外，這裏提到的清初詩歌選本也有三十多部，只是是否保存至今，我們就無從考證了。王爾綱的論述則更為詳盡：「近日選本，所得見者，則有《詩慰》、《詩源》、《扶輪》、《詩持》、《詩觀》、《詩存》。所見而未全者，則有《詩翼》、《詩志》、《詩風》、《詩表》、《詩逢》、《過日集》、《續石倉詩選》、抄本《詩存》。所聞而未見者，則有石生、雲子、山子、茂倫、蒼水、髯淵、孟舉、澹心諸先生選本。而《兩朝遺詩》，氣節為多。《告人》一集，未成而逝。……聞維揚宗梅岑先生《詩選》，篇什最詳；虞山薛孝穆、王露潛、許暘谷《今詩所》，剗剔甚精，俱未成書，殊切企慕。」⁵這裏不僅論到其所見的選本，而且還提及尚未成書的選本。據謝正光、余汝豐統計，現存順治至康熙十年（1671）間的全國性清詩選本已逾二十部，⁶基本符合清初選家對當時選本編選的判斷，亦大致反映清詩選本初興期的編刻情況。

從選本類型上看，初興期清詩選本最大的特點是遺民詩選本異軍突起。在順康間清詩選本中，遺民始終是一個主題。除卻上文提及的二十多種集中選輯遺民詩歌作品的選本外，其他選本中也隨處涉及遺民詩人的作品。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甲

³ 參見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民國十八年（1929）退耕堂刊本，〈凡例〉，頁二上。此書雖於1929年編成，但所選詩歌上起順治，下訖宣統。

⁴ 魏畊、錢价人（輯）：《今詩粹》，康熙間刊本，錢价人〈凡例〉，頁一上。

⁵ 王爾綱：《名家詩永》，康熙二十七年（1688）砌玉軒本，〈凡例〉，頁二上。

⁶ 參見謝正光、余汝豐（編著）：《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143。

申之變給廣大詩人的生活、命運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們用詩歌的形式記錄下這段歷史，表達自己的黍離之悲，詩歌創作異常繁盛。另一方面，順康時期，有清一代培養的詩人羽翼尚未豐滿，遺民詩人和入仕詩人佔據詩壇主流，所以這一時期的詩歌選本多錄遺民詩歌作品就成為必然之事。

在這些遺民選本中，有些是專門為遺民同仁而選，如《離憂集》卷首陳瑚之孫陳陸溥〈序〉云：「余祖確菴公生際橫流，……泊乎劫火既然，鳥舉雲散，肥遯於荒村寂寞之濱，憂心愁悴，崎嶇亂離，不復繫念於當世。然身雖隱而明道之心愈篤。……於是有《離憂集》，吾祖詮次諸同人之詩歌而為之傳記者也。『離憂』者何？屈原放逐，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太史公以為離騷者，猶離憂也。斯集之命名，其即此意與！嘗考有宋之季，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諸公之事而悲之。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傍徨徙倚殘山賸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其平生著述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班班可考。識者謂其身不啻滄海之一粟，而綱常繫之，誠有見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⁷更有甚者，有些選本除卻遺民外，全無他者作品。《詩南初集》全書十二卷，清初貳臣人物的詩作沒有一首與選，所收五百餘人亦均為遺民，而選者徐崧、陳濟生，作序者薛采，參訂者顧有孝、陳允衡等三十六人同樣均是遺民。當然也有一些選本是兼有遺民和入仕詩人作品的，如清初詩歌選本《鼓吹新編》、《感舊集》、《篋衍集》等就選錄有錢謙益或吳偉業等貳臣的詩歌作品。

在初興期的詩歌選本中，不論是專選遺民作品的選本，還是間有其他詩人作品的選本，都瀰漫著濃烈的遺民情緒。首先，一些選本的題目就透露出鮮明的遺民意識，如前文提及的陳瑚《離憂集》之名就取義於「屈原放逐，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太史公以為離騷者，猶離憂也」。此外，馮舒的《懷舊集》、王士禛的《感舊集》雖為懷念同人故友之作，遺民詩人及其作品還是佔據主導地位。「漁洋《感舊集》中人，勝國遺老十且四五」。⁸其次，在清初詩歌選本中，紀錄明末遺民軼事，網羅遺民詩歌文獻，成為眾多選本的編選初衷，故在選本的詩家小傳中多憶述遺民事蹟，詩歌主題「或徘徊勝國之遺事，或疾痛下民之悲詞，以及忠臣被逐、貞女烈婦之篇」。⁹這種縈繞清初士人心頭的遺民意識使其詩歌的審美風格與明末的詩歌風格明顯不同，感傷的情緒替代了狹仄的叫囂，促使了風雅性情的詩風在清初蔚然興起。

另外，從選本批評的角度來看，初興期的清詩選本也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大多數選本的批評意識與選本選文實踐間有所偏離。換句話說，選者的主觀批評意識不能自始至終地貫穿於選文實踐中，或曰選文實踐沒有充分體現出選家的批評意識。順康間的清詩選本，不論在序跋、凡例還是評注中都有明確的批評意識，如

⁷ 陳瑚（輯）：《離憂集》，民國元年（1912）趙詒琛《峭帆樓叢書》本，陳陸溥〈序〉，頁一上。

⁸ 陳衍：《感舊集小傳拾遺》（臺北：廣文書局影印，1968年），〈自序〉，頁一上。

⁹ 魏裔介（輯）：《觀始集》，順治十三年（1656）刻本，張天植〈序〉，頁一下。

姚佺輯《詩源初集·凡例》第二則云：「國史采眾詩，必明好惡。彼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也。或吳人吳吟，或楚人吳吟，皆當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自有選以來，如《金針詩格》、《風騷要式》、《詩品》、詩話之類，無不指陳利病，冀詩人之變改。《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之四詩六義，救藥也。即一詩之內，或發端、或落句，或頷聯、或頸聯，或用事、或寫景，各有格式，不可亂也。故予是選，救病為多。」¹⁰這裏指出了三點：一是詩應本於情，這是其詩學批評的一個原則；二是歷來論詩者均指陳利病，選本亦可擔當此任；三是作詩有法，亂則生弊，自己選詩的目的也是救詩之病。

有時選本的批評意識就體現在選本書名上，如「觀始」、「溯洄」、「詩粹」、「詩源」、「詩持」等書名本身都已表達出選家的良苦用心，其中的批評意識是明顯的。如《溯洄集》之名取義於《詩經·蒹葭》，魏裔介〈自序〉曰：「余茲溯洄於鉛槧之間，豈敢薄視風雅，使文人心靈，淹沒無聞。」¹¹顯然，選者希望用選詩的方法讓世人重拾風雅傳統，宣導溫柔敦厚的詩風。錢棻在為其作序時指出了該集的編選意圖：「《溯洄集》之選，所以考鏡古今盛衰之變，與發明著書之意，將以垂示來葉，釐正風氣，以求無愧古聖人刪詩之本指。」¹²

這些批評主張在初興期的清詩選本中屢見不鮮。表面上看起來，這一時期選本的批評意識已經非常自覺了，但是從選本的總體品質來看，真正能夠達到批評意識貫穿於選文實踐的屈指可數，絕大多數名實不符。這主要來自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編選風氣不正。清初部份選家在編選詩歌時不完全是出於網羅文獻、表彰風雅的目的，其中也有標榜聲氣、逢迎阿諛之作，故而在實際選文中標準失當，選擇蕪濫，魏憲的《百名家詩選》就是被評論家經常詬病的代表。陳融在《顛園詩話》中先指出魏憲《詩持》中所選詩家之作與其標榜的標準不同，「大約平日與己倡和者，美惡悉登，故有蕪濫之誚」。¹³繼而又重點批評了《百名家詩選》名實不符，主要表現為選文時偏愛當代名公巨卿及平日唱和者的作品，以致當時名家作手諸如朱彝尊、方文、屈大均、錢澄之、李因篤等均未入選。這種畏權媚俗風氣的蔓延，嚴重損害了這一時期清詩選本的整體品質。對此現象周亮工嚴詞批評：「五十年來，漸有身前自刻其詩之人。十年來，始有當代之人選當代之詩之事。至今日，盛已極，而濫亦極。今之操詩選者，於風雅一道，本無所窺，不過藉以媚時貴耳。某也貴，宜首、宜多；某也貴不某若，宜次、宜減；某也昔卑而今貴，遞增之；某也昔貴而今賤，

¹⁰ 姚佺：《詩源初集》，清初抱經樓刻本，〈凡例〉，頁二下。

¹¹ 魏裔介：《溯洄集》，康熙元年（1662）刻本，〈自序〉，頁五上。

¹² 錢棻：《溯洄集·序》，頁三下。

¹³ 陳融：《顛園詩話》，轉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056。

遂驟減之。非仕籍也，而仕籍矣；非履歷也，而履歷矣。故觀近人所選，不必細讀其中去取若何，閉其書而暗射之，則其人歷歷可數矣。此選人也，非選書也。欲求免當世之譏，且不可得，況足以流傳萬世哉。」¹⁴

其次是優秀的選家必須做到才、學、識三方面俱備，有才能「尊其創格」，有學才能「存其面目」，而有識才能「汰其熟調」。¹⁵要求如此之高，不僅眾多普通選家難當此任，就連李東陽這樣的碩彥大儒也感歎選政之難：「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¹⁶從此便可看出選家的素質對於選本是如何重要的了。

順康時期選家的高下也是參差不齊，這在當時就有論者批評：「今人賤隳糜，比戶矜著述。既無腐遷班固八斗之雄才，又無子雲長卿如椽之巨筆。眼前坐待白日昏，胸中時挺孤峰出。」¹⁷選家「於風雅一道，本無所窺」，怎能奢望他編選出的選本能真正體現其批評主張呢？故周亮工所指出的清詩選本初興期中的陋習，一方面是當時的詩壇風氣所致，一方面也是緣於選家素質的低下。由此可見，只有操選政者具備良好的素質，才能編選出選文實踐與批評意識完美結合的上乘選本。

即使如此，初興期的清詩選本還是有些精品的，陸次雲在《皇清詩選·凡例》中就為我們挑出幾本佳選：「一時佳選，惟見鄧孝威之《詩觀》、席允叔之《詩存》、宋牧仲之《詩正》、陳伯璣之《詩源》，樂其各標心眼，取益良多。」¹⁸此外，毛先舒的《西陵十子詩選》、吳偉業的《太倉十子詩選》、陶冰修、董黃合編的《雲間棠溪詩選》分別為西泠詩派、婁東詩派和雲間詩派的詩學觀念張目，均有強烈的批評意識。只是相對於魚龍混雜的初興期選本來說，這樣的選本還是太少。

清代清詩選本的繁盛期

康熙中期至乾隆中葉這七八十年的時間為清詩選本的繁盛期。這個時期，清詩選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總體數量上已達百種，遠超清詩選本的初興期。選本類型更趨多樣，除卻初興期常見的全國性選本、同人選本、遺民選本以外，還興起了地域選本、館閣詩選本、女性詩選本、御敕詩選本等多種選本樣式。選本的批評意識逐漸增強，宣揚自身或流派主張的清詩選本越來越多，且和其時的詩學思潮聯繫緊

¹⁴ 徐增（選）：《九誥堂詩選元氣集七種》，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卷首附〈周櫟園司農來書〉，頁二上。

¹⁵ 錢良擇（輯）：《唐音審體》，康熙三十四年（1695）昭質堂刻本，〈例言〉，頁一下。

¹⁶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76。

¹⁷ 黃傳祖（輯）：《扶輪新集》，順治十六年（1659）刻本，卷七，程封〈戊戌秋喜晤心甫于長安邸中放筆作歌〉；轉引自謝正光、余汝豐：《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頁18。

¹⁸ 陸次雲：《皇清詩選》，康熙間刊本，〈凡例〉，頁一下。

密。當然，在清詩選本發展的統緒中，繁盛期和初興期並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初興期選本進一步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只是隨著創作的不斷繁榮，批評的不斷自覺，康乾時期的清詩選本出現了與初興期清詩選本不盡相同的特徵，主要有兩大特點：其一，選本的選文視野不斷拓展。在清詩選本的初興期，儘管其時詩壇選風大振，但是多數選本在選文的體制、類型上以及所選作品的主題上都相差無幾。自康熙中期以來，清詩選本不論在選文數量、選本類型還是在作品主題上均有突破，選文範圍不斷擴大，選文視野不斷拓展，顯示出康乾時期清詩選本的繁盛。

從選文的數量來看，康乾時期清詩選本的選文容量逐步增大。明清之際，由於文本收集的種種不便，清詩選本雖然不囿於一地一時，但是總體來說所選作家和作品都相當有限。其中選文數量較多的如陳祚明《國門集初選》六卷，收樂府、五七言古、律、絕、排律等九體三百五十家，去其重複，見收之作者亦止百家而已，詩作千餘首；徐崧《詩南初集》也是分體選文，去其重複，共收作者五百餘人。初興期收錄作家作品最多的要屬黃傳祖編輯的《扶輪續集》、《扶輪廣集》、《扶輪新集》了，這三集共收錄啟禎至康熙早期四十餘年間的作者一千餘人。鄧漢儀《詩觀》三集分別編刻於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之間，時間橫跨康熙前、中兩期，可謂清詩選本從初興期向繁盛期過渡的一個標誌。《詩觀》三集共四十一卷，選輯了一千八百二十四位詩家的一萬五千餘首作品，遠遠超過了此前的選文數量。康熙中期以降，清詩選本收錄作家作品的數量不斷擴大，地域範圍也不斷拓展。康熙六十年（1721）編刻的《國朝詩的》可謂清初詩歌選本中卷帙最為浩繁、收錄作家最為完備、涉獵地域最為廣泛的選本。選者仿照《詩經》「列國之詩，各自為什」的體例，分省編次，「始自長白，訖於滇黔」，¹⁹共錄詩家二千九百五十四人，總六十二卷，比今人錢仲聯《清詩紀事》的《明遺民卷》、《順治朝卷》及《康熙朝卷》所收還多出一千餘首，順康兩朝詩人幾乎盡收於此。

從選者和作者的身份來看，康乾時期的清詩選本與初興期相比也有明顯的變化。初興期的選家或作者多為明末遺民或降清文臣，選文也多集中於這兩類人群的作品，作品內容也相對固定單一。康熙中期以後，遺民選者或作家慢慢隱退，新朝入仕的一代文人逐漸統領文壇，選本領域中選家和作者的身份也隨之而改變。雖然，在繁盛期的選本中仍然有不少遺民的作品，但已經不再佔據主導地位。這個時期選者和作者的身份變得更為複雜多元，正如孫鉉所說：「上則名公巨卿，下而布衣方外，其黼繡嚴廊，寤歌邁軸，無非所以鼓吹休明者也。然勝國之遺間有入者，以詩或出於交會之際，身曾處乎覆載之中，其詞可采，亦附於編。」²⁰《皇清詩選》刊刻

¹⁹ 陶煊：《國朝詩的》，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凡例〉，頁一上。

²⁰ 孫鉉：《皇清詩選》，康熙二十七年（1688）鳳嘯軒刻本，〈刻略〉，頁二上。

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從孫鉉之說可見此時遺民作品已經退居次席；而在乾隆十三年(1748)編刻的《昭代詩針》中，選家在〈凡例〉中用委婉的語氣將遺民作家作品排斥在外，不予選錄：「先輩諸公，其在前朝，久通仕籍，鼎革以後，晦跡林泉，不欲自見於世者，詩集雖佳，不敢摭入，成其志也。」²¹這裏除卻選家對其時文網的畏懼心理之外，新朝詩人的崛起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從選本的類型來看，繁盛期的清詩選本更趨多樣。在初興期，遺民選本是主流，即使是全國性選本或同人選本也是以遺民作家作品為主體，其他類型的選本很少。隨著社會的日益穩定以及選本領域自身的不斷發展，康熙中期至乾隆中葉，幾乎清詩選本中所有的選本類型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御敕選本有孫鉉的《皇清詩選》、沈德潛的《欽定國朝詩別裁集》等；²²館閣詩選本有許英輯注的《本朝五言近體瓣香集》、阮學浩等編的《本朝館閣詩》等；應制詩選本有沈玉亮等輯的《本朝應制詩賦鳳池集初編》、鄒一桂輯評的《本朝應制琳琅集》等；女性選本有胡孝思、朱琬評輯的《本朝名媛詩鈔》和范端昂的「香奩詩泐」系列選本等。地域選本也是悄然興起，並有迅猛發展之勢，具代表性的選本有潘江所輯《龍眠風雅》及《續集》、邱象隨輯《淮安詩城》、朱彝尊輯《洛如詩鈔》、隋平輯《琅邪詩略第一編》、沈堯咨等編《濮川詩鈔》、廖元度輯《楚詩紀》及《楚風補》、盧見曾等輯《國朝山左詩鈔》、王應奎輯《海虞詩苑》等。

與選本類型多樣化相適應，繁盛期的作品主題也漸趨多元，幾乎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是康乾盛世選本走向繁盛的一個重要標誌。

其二，選本的批評品質整體提升。前文已提到，初興期的清詩選本在整體品質上良莠不齊，精品不多。隨著選家態度轉趨矜慎，批評意識逐步增強，康乾時期的清詩選本在批評品質上大為提升。這也成為清詩選本走向繁盛期的又一個標誌，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康乾詩壇中的主要詩學思潮、觀念都或多或少地在清詩選本中有所體現。康熙初期崇尚宋詩的風氣盛行，打破了明末清初以雲間、西泠派為代表的宗唐詩學一統天下的格局。自此，清代詩壇就出現了崇唐宗宋交替發展的情況，選本領域也成為標榜詩學傾向、展開詩學論爭的重要陣地。宗宋詩學傾向見於清詩選本中，首發其端的是康熙十一年吳之振選編的《八家詩選》。吳之振在〈序〉中首先批評了當時規摹唐人而無個性的詩風：「今世作者，取他人殘賸之鬻汁，更相選絮。李所吟詠，無別於張；贈甲之篇，移乙亦得。」繼而敘述了他到京城與宋琬、施閏章、王士禛等人往還唱酬的情景，且指出了其時這一群體的詩風轉變：「余辛亥

²¹ 吳元桂：《昭代詩針》，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凡例〉，頁一下。

²² 康乾年間出現不少御選本，在《四庫全書·總集類》中，直接於書名前標明「御定」、「御選」、「御制」字樣的總集就有十八種之多，但這些選本多選前代詩文，涉及清代的僅有文選《皇清文穎》，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御選清詩選本。所以，我們將御敕選本的外延稍作擴展，將皇帝欽定大臣編選或親自披覽、作序的選本也泛稱為御敕選本。

至京師，初未敢對客言詩，間與宋荔裳諸公相遊讌。酒闌拈韻，竊窺群制，非世所謂唐法也。」²³

稍後有王士禛在康熙十六年(1677)編刻的《十子詩略》，選刻其時取法宋人的詩家如宋犖、王又旦、田雯等十子之詩。宋犖是清初宋詩派的主將，不僅作品被選入《十子詩略》等選本，而且還編選了《江左十五子詩》，為宗宋思潮推波助瀾。此外，在地域選本中，也有宗宋傾向的清詩選本，如王應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編刻的《海虞詩苑》。

當然，這一時期的宗唐選本仍佔據一定的地位，如康熙二十七年倪匡世編刻的《振雅堂彙編詩最》，其〈凡例〉開宗明義說道：「唐詩為宋詩之祖，如水有源，如木有本。近來忽有尚宋不尚唐之說，良由章句腐儒，不能深入唐人三昧，遂退而法宋，以為容易入門，聳動天下。一魔方興，眾魔遂起，風氣乃壞。是集必宗初盛，稍近蘇陸者，不得與選。」²⁴此外鄧漢儀的《詩觀》諸集、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七子詩選》等也多是宣揚宗唐詩學的選本。但由於選本不免於兼容並蓄，更多選本是折中唐宋的，如吳藹的《名家詩選》，其〈凡例〉云：「三百篇而後，如漢魏詩，莫可崖涘。至唐則初盛中晚，樹幟揚鑣。宋則名流接踵，標新競異，俱後學之指南。自尊唐者薄宋，禰宋者祧唐，而路始歧矣。愚謂詩無定格，總以抒寫性靈、出入風雅者為佳。是選唐音與宋節兼收，初不別分蹊徑。要之追蹤古人則一云爾。」²⁵可見，伴隨著諸種詩學思潮的不斷湧現，繁盛期選本的批評意識也大大提升。

其次，繁盛期的清詩選本大多具有為盛世詩風樹立標準的批評意識。經過明清之際一段混亂無序的選本刊刻風潮之後，清初選家逐漸開始重視選本的批評價值，企圖利用選本的選文實踐來引領康乾盛世的詩歌發展。於是，選者紛紛選出以為可以代表清初盛世詩風的作家作品，來引領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如顧施禎《盛朝詩選初集·自序》中所云：「欲執頌之體，而求寬靜柔正也；執雅之體，而求廣大而靜疏達而信也；執風之體，而求正直廉謙也。……禎久客京華，不揣鄙陋，仰體皇上崇經尚古，竊見朝野風雅炳鬱，敢取昭代之詩，選輯成書，名曰《盛朝詩選》。」²⁶

這裏透露出兩點重要的信息：(一)康熙朝以來，詩人不論宗唐還是宗宋，其詩歌創作風格仍是以「詩三百」中的風雅傳統為最高訴求，具體來說，就是溫柔敦厚，中正和平。康乾時期的選本如《振雅堂彙編詩最》、《國朝詩正》、《清詩大雅》等從書名就可看出選家鮮明的批評意識，此外，這一時期直接以「風雅」命名的地域選本就有十餘部；(二)這一時期的清詩選本對詩壇創作風格的定位與康乾盛世是密切相關

²³ 吳之振：《八家詩選》，康熙十一年(1672)刊本，〈序〉，頁三下至四上。

²⁴ 倪匡世：《振雅堂彙編詩最》，康熙二十七年(1688)懷遠堂刻本，〈凡例〉，頁一上。

²⁵ 吳藹：《名家詩選》，康熙四十九年(1710)學古堂刻本，〈凡例〉，頁一上。

²⁶ 顧施禎：《盛朝詩選初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心耕堂刻本，〈自序〉，頁二上。

的。一方面，盛世的時代背景適合詩人的頌聖歌功；另一方面，文人也有自覺「鳴盛」的創作欲望。二者相互結合，使得詩教傳統與政教統治完美統一起來，於是崇尚風雅的詩教傳統在康乾時期大行其道。詩人創作時恪守風雅傳統，詩風溫厚和平，選家在選擇詩作時同樣如此，且在選本中大力宣揚這種詩風，久而久之，溫柔敦厚便成為有清一代的典型詩風。此一時期具代表性的選本有《皇清詩選》、《國朝詩的》、《清詩鼓吹》等。

此外，繁盛期的清詩選本和初興期一樣，也有流派意識非常強的同人選本，如《江左三大家詩選》和《嶺南三大家詩選》等，這些選本加速了「江左三大家」、「嶺南三大家」的經典化進程，同時也標榜了各自詩派的流派意識。

清代清詩選本的轉型期

清代中葉社會環境穩定，但是政治文化環境卻並未因此變得寬鬆自由。自乾隆帝執政後半期始，清廷的文化政策逐漸暴露出其嚴酷的一面。大規模的禁毀圖書和一系列的文字獄，使文人誠惶誠恐，心靈顫慄，改變了這一時期的學術文化生態。大量清詩選本遭到了禁毀，選本的批評意識也被迫淡化。同時，經歷了初興期和繁盛期之後，清詩選本的諸種類型在清中葉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其中，批評意識較弱的地域選本在這一時期獨佔鰲頭，佔據了清中葉詩歌選本的絕對地位。總之，這一時期的清詩選本，不論在外部存在形態還是內部的批評意識上，都和前兩個階段大為不同，清詩選本步入了轉型期，下文分三小節論述。

(一) 政治干預，選本遭禁。

乾隆朝對清詩選本的干預是從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開始的。沈德潛大器晚成，乾隆四年(1739)中進士時已經六十七歲高齡了，但自躋身官場之後，備享乾隆榮寵。他的詩既受到乾隆的賞識，又常出入禁苑，與乾隆唱和並論及歷代詩的源流升降。由於受到皇帝隆遇，沈氏的詩論和作品在乾隆時期風靡一時，影響甚大。

然而好景不長，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沈德潛將所輯《國朝詩別裁集》進呈乾隆並乞序，弘曆閱覽後龍顏不悅，對其再三申斥，主要列舉三大罪狀：不應以錢謙益冠籍；錢名世詩不應入選；慎郡王詩不應稱名。²⁷於是，乾隆下詔命內廷翰林刪改重編，仍定三十二卷，將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錢名世、屈大均等人之作盡行刪除。同時命將原刻兩種版本(初刻三十六卷、重刻三十二卷)的版片盡數銷毀，以防民間流傳，《國朝詩別裁集》遂成為禁書。此後，乾隆一直懷疑沈德潛有二心。乾隆三十四年(1769)，弘曆特命兩江總督高晉搜查沈家，看有無私藏錢謙益詩文集，未得到證據，遂作罷。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一日，又命江蘇巡撫楊魁查察初刻、重刻兩種《別裁》板片的禁毀情況。

²⁷ 參見弘曆：《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53。

在沈德潛逝世後九年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蘇又發生了徐述夔《一柱樓詩》「逆書」大案。沈德潛曾為徐氏作傳且讚其「文章品行皆可法」，乾隆獲知後勃然大怒，先後收回以前追贈沈德潛的太子太師官銜及諡號，以及過去賜賞之物，將沈氏族撤出賢良祠，並損毀沈墓前碑石。至此，由《國朝詩別裁集》引發的沈德潛案基本告一段落。

若追溯這起文字獄的深層原因，主要根源於兩個方面：一是政治統治的需要。乾隆執政以後，躬逢盛世，國運昌隆，但朝廷對漢族文人的提防卻日益加強。乾隆朝大張旗鼓地編選《四庫全書》與大規模的查禁圖書，其目的都旨在加強對漢族文人的思想鉗制，只不過修書運用的是懷柔籠絡的方法，禁書運用的是殘酷打壓的政策。具體到沈德潛案，其主要導火線實源於錢謙益等貳臣觸犯了帝王的忌諱。但據考證，乾隆帝欽定《貳臣傳》的時間為乾隆四十一年，而其大規模的查禁圖書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這就意味著，乾隆的貳臣觀念早在批評《國朝詩別裁集》的乾隆二十六年就已經孕育成熟，查毀與貳臣詩作相關圖書的意念也是由來已久。而又恰逢沈德潛為其時文壇名宿，拿他是問顯然有風向標的意圖。所以，沈德潛的文禍是乾隆文化政策轉向的前兆，不論沈德潛是否乞序於他，最終的命運都是一樣的。

二是詩學觀念的衝突。沈德潛既是館閣大臣，更是詩壇聖手，其「以詩存人」的選詩標準與朝廷的政教詩學觀相左，這也是引發沈德潛案的一個重要原因。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凡例》中明確提出了「以詩存人」的選文標準：「是選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蓋建豎功業者重功業，昌明理學者重理學，詩特其餘事也。故有功業、理學可傳，而兼工韻語者，急采之。否則人已不朽，不復登其緒餘矣。觀者諒之。」²⁸這裏，沈德潛的態度非常鮮明，用其〈自序〉之語即此選「惟取詩品之高也」。²⁹就是說那些視詩歌創作為餘事之人，即使在功業、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也不入選；反之，以詩歌創作成就躋身詩壇者，即使位卑身賤、偏於一隅者，也盡采入。乾隆在《欽定國朝詩別裁集·序》中也旗幟鮮明地表述自己的觀點：「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詩也。」³⁰論詩首重「忠孝」之人品。由此可見，沈氏「以詩存人」的「詩品優先論」顯然與官方詩學「以人存詩」的「人品優先論」相齟齬。由於沈德潛堅持詩歌本位的詩教原則，選詩評詩完全以詩歌成就為標準，故錢謙益等貳臣可以冠本朝之首，遺民詩人可以得到讚譽，罹案要犯可以得一席之地，而身為皇帝叔父的慎郡王也只是一個名允禧的詩人。這種「以詩存人」的選詩標準顯然為乾隆所不容，也必然導致《國朝詩別裁集》纒觸文網。

²⁸ 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刻本，〈凡例〉，頁一下至二上。

²⁹ 同上注，〈自序〉，頁二上。

³⁰ 沈德潛：《欽定國朝詩別裁集》，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乾隆序本，弘曆〈序〉，頁一上。

《國朝詩別裁集》僅僅是清廷政治干預選本的源起，自此以後，只要是涉及到沈氏選本中三大罪狀之一的書籍，就要查禁抽毀，連清詩選本也一併遭殃。僅據《清代各省禁書彙考》統計，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七年（1792），全國各省禁毀的清詩選本就多達三十六種，七十次。³¹

（二）全國性選本的數量及其批評品質均下降。

《清代各省禁書彙考》中所列遭禁的清詩選本，除卻少數同人選本外，絕大多數是清初具有強烈批評意識的全國性選本。這些選本或者含蘊著鮮明的文學史觀念，或者流露出選家自身的文學主張以及流派意識。這些全國性選本遭到禁毀以後，直接影響到了清中葉全國性選本的文本收集以及批評品質。

首先在數量上，這一時期的清詩選本與前兩個階段相比，全國性的選本有所衰微。據謝正光、余汝豐統計，現存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全國性清初詩歌選本就有四十七種，而事實上遠遠超過這一數字。因為乾隆時期大規模的查禁圖書多和明末遺民或入仕貳臣有關，幾乎所有清初的全國性選本都在查禁之列，所以，現在倖存的清初選本只能佔其時選本的一小部份，其餘都已散佚毀禁了，僅《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附錄中所列的待訪選本就達二十五種。³²轉折期流傳至今的全國性選本只有乾隆中後期王錫侯輯《國朝詩觀》、《國朝詩觀二集》，陳毅輯《所知集》，項章輯《國朝詩正聲集》等；嘉慶年間有鐵保編刻《熙朝雅頌集》、王昶輯《湖海詩傳》、王豫輯《國朝今體詩精選》、《群雅集》、潘瑛輯《國朝詩萃初編》、程嘉訓輯《國朝試律摘藻集》等；道光年間有王相編《國初十大家詩鈔》等寥寥數種，與前兩期相比，數量懸殊。

實際上，乾隆朝中後期完全具備編選全國性選本的有利條件。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修書，編纂者均為知名的學者文人，這些名士碩儒齊聚京城，其詩作也容易搜集，如有操選政者主持此事，那麼編選出的詩歌選本，按理應該水準較高，且具有代表性，但事實並非如此。清初全國性選本的繁盛局面並沒有延續到清中葉，這一方面和其時嚴酷的文字獄有關。全國性選本最大的特點就是選擇的範圍廣闊，詩家眾多，這其中只要有一位詩家作品被列為禁毀對象，或者一句詩詞有違逆不當之處，此選家就有身被文禍之虞，所以在沈德潛案以後，很少有人對全國性的詩家作品作大規模的篩選編刻。另一方面，清中葉時各省乃至偏僻鄉邑，詩風甚盛，數量驚人，全國性的清詩選本在選詩時難免會掛一漏萬，這也是清中葉全國性選本式微而地域選本發達的重要原因。

此時的全國性選本，不僅量少，總體批評水準也不如以前。這一時期詩歌選本中最著名的要數王昶所輯《湖海詩傳》四十六卷，該選本起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

³¹ 此統計資料係據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整理而成，其中選本有續集者以一本計。

³² 參見謝正光、余汝豐：《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頁368-70。

終於嘉慶八年(1803)，保存六百多位詩人的作品。其中少部份詩人，曾選入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中，所以大體上可以承接沈書。王昶在選本中只選交遊所及詩人的作品，不選其他作品，自稱：「蓋非欲以此盡海內之詩也，然百餘年中，士大夫之風流儒雅，與一國詩教之盛，亦可以想見其崖略。」³³總的來看，此書選錄了清中葉的著名詩人的一些代表作，保存若干不易見到的詩作，可算是清代一部有價值的詩歌總集。由於王昶為沈德潛門生，故此選亦承其衣鉢，尊崇唐音，也可視為「格調派」詩歌主張的繼承者和宣傳者。當然，也正是因為此選以格調派眼光為去取標準，以己律人，而不能隨人之所長，故選本中所取者往往徒存聲調，庸庸平弱，影響了選本的價值。不過詩人小傳下所附《蒲褐山房詩話》，詩評史料十分豐富，批評價值和文獻價值俱佳。

嘉慶初年還有一個全國性的清詩選本值得關注，那就是由嘉慶皇帝欽定、鐵保編選的《熙朝雅頌集》。此選專選滿族王公貴族、文人武士以及八旗中閨閣之作，為研究滿族的詩歌創作和詩歌觀念，以及清朝統治者的文治政策，留下了鮮活的文本資料。

(三) 地域選本數量激增，批評品質參差不齊。

乾隆中期以降，清詩選家紛紛將編選視角從全國範圍轉向了特定的區域，地域選本蔚然成風。主要分成三類：一是純粹以搜羅某一特定地域的詩歌為目的的地域選本，代表作有袁景輅等輯《國朝松陵詩徵》、傅玉書輯《黔風》、商盤輯《越風初編》、李調元輯《蜀雅》、張廷枚輯《國朝姚江詩存》、汪學金輯《婁東詩派》、袁文典、袁文揆兄弟輯《國朝滇南詩略》、阮元輯《兩浙輶軒錄》、吳顥輯《國朝杭郡詩輯》、姜兆翀輯《國朝松江詩鈔》等；二是以地理學上指稱的某些區域為選擇對象的地域選本，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鳴盛輯《江左十子詩鈔》二十卷、嘉慶年間李錫麟輯《國朝山右詩存》二十四卷、嘉慶元年(1796)朱良焯、陳泰編《國朝江左詩鈔》十卷、嘉慶十一年(1806)朱良焯編《國朝江左詩鈔二編》十二卷、嘉慶十八年(1813)張鵬展輯《國朝山左詩續鈔》三十二卷以及曾燠輯《國朝江右八大家詩選》等等，這裏的「江左」、「江右」、「山左」、「山右」都是一個較大區域的概稱。古時在地理上以東為左，以西為右。「江左」即江東，長江以東。因長江在安徽境內向東北方向斜流，而以此段江為標準確定東西和左右，所指區域有大小之分。「江左」或江東可指南京一帶，也可指安徽蕪湖以下的長江下游南岸地區，即今蘇南、浙江及皖南部份地區；「江右」則主要指現在的江西；「山左」主要指山東，「山右」則為山西；三是以某一地區的部份名家為輯錄對象的地域選本，實際上既是地域選本，同時又是名家選本，如王鳴盛輯《江浙十二家詩選》二十四卷、章日照編《靈岩三家詩選》四卷、吳應和輯《浙西六家詩鈔》六卷、張學仁輯《京江七子詩鈔》七卷等等。這些地域選本的類型在清

³³ 王昶：《湖海詩傳》，嘉慶十八年(1813)刊本，〈自序〉，頁一下。

初都出現過，且有知名的選本，如《西陵十子詩選》、《太倉十子詩選》、《江左三大家詩鈔》、《嶺南三大家詩選》等，只是在數量上遠比不上轉折期的地域選本。

雖然清中葉的地域選本方興未艾，但是批評水準卻參差不齊。許喬林在《胸海詩存·凡例》中分別引述了鐵保和阮元對地域詩選的看法，而這兩人的看法恰可視為地域詩選的兩大編選目的：

鐵梅庵先生自序《白山詩介》曰：「讀古詩不如讀今詩，讀今詩不如讀鄉先生詩。井里與余同，風俗與余同，飲食起居與余同，氣息易通，瓣香可接，其引人入勝較漢魏六朝為尤捷。」阮雲台先生自序《淮海英靈集》曰：「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耆舊之逸轍，采淮海之淳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喬林今編《胸海詩存》，亦期於聚者易傳，而瓣香可接耳。³⁴

這裏提及的「瓣香可接」和「聚者易傳」即為地域詩選的主要編選意圖，前者強調承繼或學習鄉賢的優秀品質，包括人品和詩品。這類地域選本有強烈的批評意識，試圖在對鄉賢詩歌的整理、篩選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或惠澤當下讀者，或延續詩學主張，如嘉慶年間汪學金編纂的《婁東詩派》，婁東即今江蘇省太倉縣一帶，出現過如王世貞、吳偉業之類的大詩人，有良好的詩學傳統，特別是清初吳偉業撰寫的熔鑄唐初四傑的詞藻和元白的通俗流暢於一體的七言歌行風靡一時，形成了在當時頗有影響力的「婁東詩派」，仿效者如《太倉十子詩鈔》中的「太倉十子」也都成績斐然。此選本顯然是對明清以來婁東詩派源流的梳理，具有鮮明的流派批評意識，對其時的婁東士子有直接的影響。

道光元年（1821）王豫刊刻大型地域選本《江蘇詩徵》，選輯清朝以來江蘇各州府之詩，錄入詩家多至五千四百餘家，共計一百八十三卷。阮元〈序〉云：「柳村〔王豫〕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摭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³⁵可見《江蘇詩徵》選文並不是以搜羅本地詩歌為唯一目的，其中也貫穿有選家的詩學批評意識。此外，王鳴盛的《江浙十二家詩選》為其時的宗唐詩學思潮張目，吳應和的《浙西六家詩鈔》為宗宋詩學思潮宣傳等等。這部份清詩地域選本均具有較強的批評意識，對特定地域乃至全國的詩學思想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過，大部份地域選本的選文初衷其實是「聚者易傳」，即搜集地方文獻，網羅散佚作品，保存相關史實，如李錫麟論到《國朝山右詩存》的編選目的時云：「為一方備掌故，非為後學示法程，故所存不執一格。」³⁶姚椿序朱彬《白田風雅》云：「先生

³⁴ 許喬林：《胸海詩存》，道光十一年（1831）許氏刊本，〈凡例〉，頁三下。

³⁵ 王豫（輯）：《江蘇詩徵》，道光元年（1821）焦山海西庵詩徵閣刊本，阮元〈序〉，頁一上。

³⁶ 李錫麟：《國朝山右詩存》，嘉慶六年（1801）刊本，〈例言〉，頁二上。

清修儉節，謙以接士，寒暑嗜學，不少輟簡，嘗因邑中前輩之舊，編輯國朝以來諸家詩為《白田風雅》若干卷，網羅放失，搜纂軼事，善雖微而必錄，人雖陋而必彰。」³⁷此外尚有《國朝滇南詩略》、《國朝松江詩鈔》、《沙溪詩存》、《國朝江左詩鈔》、《國朝湖州詩錄》、《國朝嶺海詩鈔》、《國朝畿輔詩傳》、《潞安詩鈔》等等。這些選本，選家沒有明確的選擇意識，基本上是採取以人存詩和以詩存人相結合的標準，選本的批評意識多是從選本的文獻保存功能衍生出來的，沒有自覺的流派意識或詩論主張。但是這些選本對某特定區域詩歌創作的梳理，我們也可稱之為選本的文學史觀念，如關於山東省的地域選本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盧見曾編刻的《國朝山左詩鈔》六十卷、嘉慶十八年張鵬展所輯的《國朝山左詩續鈔》三十二卷、道光二十九年（1849）余正西編輯的《國朝山左詩彙鈔後集》三十卷等，若將這三個地域選本綜合來看，山東一帶自清初至道光年間的詩歌創作情況便一目了然，可謂時下所稱的「山東清代文學史」。這種地域選本中含蘊的文學史觀念也是選本批評意識的重要組成部份，對有清一代地域文學史的構建厥功甚偉。

當然，清中葉除了地域選本迅猛發展外，其他類型的詩歌選本如應制詩選本以及女性選本等也都漸次繁榮起來。應制詩選本如法式善等輯《同館試律彙鈔》、馬大亨編《國朝試帖典林》、阮元訂《山左詩課》、王芑孫編《試貼詩課合存》及《泃東近課》、程嘉訓輯《國朝試律摘藻集》、周世緒輯《句東試帖》等。女性選本在清初的基礎上也有所發展，出現了如任兆麟編《吳中十子詩鈔》四卷、袁枚輯《隨園女弟子詩選》六卷、惲珠輯《國朝閩秀正始集》及其《續集》等品質較高的閩閣選本。其中《隨園女弟子詩選》乃袁枚選輯二十八位女弟子之詩，一時蔚為風氣，嗣後翻刻迭出且遠播域外。如日本學者大窪詩佛便將袁氏此選削減而成《隨園女弟子詩選選》，刪為十九人，併六卷為二卷。另外，道光年間惲珠輯《國朝閩秀正始集》也是重要的清詩閩閣選本。該選正文二十卷，共選詩一千五百六十三首，附錄一卷選詩八十一首，補遺一卷選詩九十二首。共計選詩一千七百三十六首，涉及閩秀詩人九百三十三人；其《續集》收錄惲珠手訂詩作十卷及附錄一卷，共計選詩九百一十九首，涉及女詩人四百五十九人，妙蓮保之母又輯補遺一卷，涉及女詩人一百三十四人，選詩三百一十首。選家惲珠的編選意圖是為閩門樹立典範，即黃友琴所言之「整壹人心，扶持壺教」。³⁸故在作者人品上要求必須是貞靜幽淑者，否則即使是官宦之後或閩閣名媛，亦被剔除；在詩作風格上，「是集所選以性情貞淑，音律和雅為最」，³⁹即必須要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

³⁷ 朱彬（輯）：《白田風雅》，光緒十二年（1886）金陵刊本，姚椿〈序〉，頁一下。

³⁸ 惲珠（輯）：《國朝閩秀正始集》，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刊本，黃友琴〈序〉，頁四上。

³⁹ 同上注，〈例言〉，頁五上。

清代清詩選本的總結期

清末的詩歌選本在轉折期選本類型多樣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全國性選本逐漸增多，且出現了幾部大型選本，地域選本旺盛如昔，女性選本也有所拓展。隨著選本規模的不斷擴大，選本的文學史觀念也逐漸增強。不論何種類型的清詩選本，都對有清一代的詩歌創作進行整體性地或局部性地梳理、總結。另外，由於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學術文化觀念的革新，清末詩歌選本在所選詩歌的題材上普遍比以前更為廣泛，主題上也更為貼近社會現實，流露出的詩學思想更具實用性。當然，那些宣傳詩歌流派主張的選本仍然存在。下文試就總結期的特點分三小節討論。

(一) 規模不斷擴大，選本的文學史觀念逐漸加強。

在清詩選本的初興期和繁盛期，除了《詩觀》、《國朝詩的》等以外，大部份選本規模適中；轉折期內由於全國性選本較少，大型的詩歌選本很難產生。到了清末，一方面，清初及中葉近兩百年的詩歌積累甚巨，可供選擇的名家名作眾多。另一方面，「國家不幸詩家幸」，⁴⁰ 清末的社會動亂刺激了詩人的創作欲望，紛紛用詩歌來反映現實生活，湧現出一大批有社會責任感的詩人，這些詩人詩作的出現也為選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所以，清末詩歌選本包括全國性選本、地域選本或閩閩選本都有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有助於清代詩歌史的梳理和總結。

清末規模較為宏大的詩歌選本主要有符葆森的《國朝正雅集》、張應昌的《清詩鐸》以及徐世昌的《晚晴簃詩匯》。

《國朝正雅集》，又名《國朝寄心集》。正集一百卷，補編二十卷。收自乾隆元年（1736）至咸豐八年（1858）一百二十二年間二千餘家詩人八千餘首詩作，「其體例一沿《別裁》，而收采較富」。⁴¹ 選者符葆森，字南樵，江都（今揚州）人。幼工詩賦，豪於酒，廣交遊，師事姚瑩，與張維屏、徐榮、朱琦為友。因家貧，搜集詩家資料甚為艱辛，此集採用書目多達一百二十八種。

《清詩鐸》，原名《國朝詩鐸》。選者張應昌，字仲甫，號寄庵，嘉慶十五年（1810）舉人，官至中書舍人。他晚年編選兩部清代詩集，一為《國朝正氣集》，已亡佚；一即本集，二十六卷。始選於咸豐六年（1856），完成於同治八年（1869），其間屢經增刪，共選入清初（包括明代遺民）至同治年間詩人九百一十一家，詩二千餘首。

最大規模的清詩選本是清末徐世昌編纂的《晚晴簃詩匯》二百卷，此書收錄清詩二萬七千餘首，作者六千一百餘家。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直隸天津人。光緒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選家云：「選詩義例本竹垞《明詩綜》，參以漁洋《感舊》、

⁴⁰ 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題元遺山集〉，頁772。

⁴¹ 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咸豐七年（1857）刻本，陶樸〈序〉，頁一下。

歸愚《別裁》，不分同異，蒼萃眾長。……自名家、大家外，要皆因詩存人，因人存詩，二例並用，而搜逸闡幽，尤所加意。」⁴²編選態度通達，對於清初到清中葉的詩基本上照顧到各派、各種風格、題材的作品。大家、名家則多「采其尤以示規範」的作品，對於一般作者則相對寬泛。編者還采輯到省、縣方志，各朝清詩選本和抄本，保存了一些流傳稀少的作品和名不見經傳詩人的歷史資料。對於晚清作品由於耳目所及，利益攸關，所以多存偏見，一些宣導詩界革命的作者入選作品較少，而且多非其代表作。

地域選本中也有若干大型者，資料搜集甚多，涉及詩家詩作也為一般詩選所不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國朝杭郡詩輯》及其續集。

《國朝杭郡詩》系列選本涵蓋三輯，首輯為嘉慶五年（1800）吳顥所輯的《國朝杭郡詩輯》十六卷，本書「自國初以訖嘉慶，采四朝熙皞之風，一百五十年之作，而且上及遺民，旁及閨秀方外，兼錄及於姓名未著、寄籍流寓之詩，凡得一千四百餘人」。⁴³越三十年，吳振棫「更為《杭郡詩續輯》，益網羅舊聞，人系以傳，載其行事，及他所著錄，刊成于道光甲午〔1834〕之歲」。⁴⁴此次續輯擴為四十六卷，詩作更為繁富。至光緒十九年（1893），丁申、丁丙輯成《國朝杭郡詩三輯》一百卷。「兩先生劬學耆古，中更兵燹，奮然以抱遺訂墜為志。既取《詩輯》、《續輯》覆刻之，乃博采道光以來之詩，而前百餘年為舊所未采者並補錄焉」。⁴⁵共選詩家四千七百八十五人，遠遠超出前兩輯。

另外，清末也出現了卷帙浩繁的閨閣詩選本。咸豐三年（1853），黃秩模所編《國朝閨秀詩柳絮集》在規模上遠甚於《國朝閨秀正始集》。此集正文五十卷，補遺續編共三卷，「就管窺所及，綴為裘腋之成。概采蘭芬，命名柳絮。姓無先後，分韻而朗，若列眉集，自流傳羅珍，亦姑存片爪。統計幾於萬首，兼綜倍乎千家」。⁴⁶選錄詩家多達一千九百三十八人。

清末的大型詩歌選本，選錄詩家眾多，詩作更是動輒上千，多則過萬。如此規模的單部選本或專題選本保存了有清一代的詩歌文獻，不論在選輯標準或具體評價過程中有無缺憾，數以萬計的詩歌作品得以保存流傳，就是這些詩歌選本的最大貢獻。另外，這些選本在選文時一般具有時間跨度大、搜羅範圍廣等特點，體例編排上將詩家小傳、作品以及評點箋注相結合，描繪出有清一代或某一區域、群體的詩歌發展全貌，充分彰顯出選家的文學史觀念。

⁴²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凡例》，頁一上。

⁴³ 吳顥：《國朝杭郡詩輯》，嘉慶五年家刻本，〈自序〉，頁一上。

⁴⁴ 丁申、丁丙（輯）：《國朝杭郡詩三輯》，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吳慶坻〈序〉，頁一上。

⁴⁵ 同上注。

⁴⁶ 黃秩模：《國朝閨秀詩柳絮集》，咸豐三年（1853）刊本，〈自敘〉，頁二上。

(二) 選文題材廣泛，詩學觀念更傾向於經世致用。

自道光二十年(1840)始，清王朝進入急速衰落直至全面崩潰的時代，隨著西方堅船利炮而來的西方文化使得中國與中華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巨變。這一時期的仁人志士，不滿於國學的空疏無益，主張關心民瘼，重新提倡經世致用思想，代表人物有林則徐、龔自珍、姚瑩、包世臣、魏源等。他們主張一要譏切時弊，二要倡言社會改革。經世派文人懷著憂國憂民的心情，抨擊社會的積弊沈痾。他們在作品中描繪出清王朝吏治敗壞、軍備廢弛、社會經濟凋零、道德淪喪的真實情景，反映出人民對清朝腐朽統治的強烈不滿。也因為此，清末選本中所選詩歌的題材相當廣泛，且貼近現實，可謂是用詩歌的形式記錄下清朝末年的歷史片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清詩鐸》、《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等。

張應昌在《清詩鐸·自序》中就以《詩經》的「興觀群怨」為主旨，以杜甫、白居易的新樂府詩為榜樣，闡述了自己的編選目的：「《國朝詩鐸》，以是為遭人之警路，以是佐太史之陳風，覽者苟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豈曰小補之哉？」⁴⁷在如此編選主旨的指引下，選本所選詩歌廣泛地反映了清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具體涉及歲時、財賦、漕船、流民等一百五十二個類型，橫向上可以說基本上囊括了清王朝政治、經濟、軍事、邊防、各不同階層人等的生活以及社會倫常、道德風俗等內容；從縱向角度講，本詩集上起明遺民詩，下止於作者生活的同治年間。有清一代，自順治至同治大清王朝之關乎民生疾苦、政治風雲、軍事動亂、百業世態、文化倫理等各方面的詩幾乎搜羅殆盡，這又可視為一幅大清王朝從發展、興盛到逐步走向衰落的歷史畫卷。這種選目在清詩選本的前三個階段中很少見，不僅契合了當時社會經世致用的學術文化背景，同時也說明選家的詩學思想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即從利用選文闡述詩歌主張到利用選文經邦濟世的嬗變。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分甲、乙兩集，各八卷，孫雄編纂。雄原名同康，字師鄭，江蘇昭文(江蘇常熟)人。光緒甲午(1894)進士，吏部主事。道咸同光正是清王朝內憂外患層出不窮、重大歷史事件接連不斷的時期。此集所收詩篇多是反映這一歷史階段社會問題的史詩，目的是希望引起整個統治階級的注意，以挽救危亡，多數詩篇含蘊悲憤哀怨的感傷情懷，如王鐵珊的〈和易哭龔順鼎韻四首〉其一：「匹馬長城見窟泉，上都宮闕夕烽邊。穹窿遠下諸陵拜，轉戰誰容一劍前。不有艱危多難日，豈看社稷中興年。風塵逆旅鳶肩客，回首關門已泫然。」⁴⁸另外也有借詩以存史之意。孫雄說：「吾所錄無以名之，姑名詩史，亦史料而已。以為史則去取必嚴，以為史料則去取之不嚴，留以待後人之去取可也。」⁴⁹書中多錄史詩，如張維屏描寫鴉

⁴⁷ 張應昌(編)：《清詩鐸》，同治八年(1869)刊本，〈自序〉，頁一下。

⁴⁸ 孫雄(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宣統二至三年(1910-1911)自刊本，甲集卷五，頁九一上。

⁴⁹ 同上注，陳衍：〈乙集敘〉，頁三下。

片戰爭中事件的〈三將軍歌〉等，登錄當代的作品則多取之於作者的手稿，為保存當時的詩歌文獻作出不小貢獻。

(三) 宣揚流派主張的詩學選本依然存在。

清末的詩歌流派和選本如同其時的政治傾向一樣，也有先進和保守之分。先進者主張詩歌反映波瀾壯闊的社會現實，直面社會矛盾，抒發真實情懷，自覺吸收西方文化，主動描寫新生事物；保守者則堅決維護傳統，主張復古，反對新變，對現實的關注較少。同光體代表作家陳衍編纂的《近代詩鈔》就屬於保守者。此書收自咸豐初年(1851)至辛亥革命之後陳氏所能見到的詩人作品共三百七十家，人各一卷，不選壽詩、擬古詩，少選詠物、長慶體、長短句，因此入選作品一般都具有藝術性，但詩歌內容上和《清詩鐸》和《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卻有所不同，多為抒寫個人感情和日常生活瑣事之作，很少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雖然《近代詩鈔》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上，均要遜於上述選本，但是此選本是晚清宗宋詩歌流派同光體的重要宣傳載體，選輯同光派詩人的作品也最多，而詩界革命參加者的作品則選得很少。

清末另外一個具有流派批評意識的選本是《晚清四十家詩鈔》。選家吳闈生是桐城領袖吳汝綸之子，又問學於大詩人范當世，范當世的老師又為桐城的另一大文人張裕釗，故吳闈生與桐城派的淵源頗深。選家〈自序〉謂此選本「以師友源瀾為主」，⁵⁰選文側重選輯晚清桐城詩派諸家作品。這種選文編排意圖十分明顯，即通過此選軌範桐城派，重振桐城派詩風。

結語

通過以上四個時期的梳理，我們不僅縱向地了解了清詩選本的發展脈絡，也能從中窺見每個階段的不同特點。順治至康熙初年，清詩選本開始興起。這一時期，大量的遺民主題的作品瀰漫於詩壇，選本所能發揮的批評作用也參差不齊。自康熙帝執政後，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都相對寬鬆，清詩選本步入了迅速發展的繁盛期。這一時期的選本類型完備，批評質量大幅提升。自乾隆中期至道光後期，雖然社會環境相對穩定，但是學術環境卻不自由，所以清詩選本的命運也隨之受到影響。學術界的考據之學和文化界的查禁圖書，導致地域選本大量出現，這是清詩選本轉折期的最大收穫。鴉片戰爭以後，清廷逐漸走向末路，此時社會環境緊張，學術研究卻更為自由。這時一批帶有總結性的大型詩歌選本相繼刊行，為這個末代王朝的選本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⁵⁰ 吳闈生(評選)、寒碧(點校):《晚清四十家詩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自序〉,頁25。

On the Periodiz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Qing Selections of Qing Poetry

(A Summary)

Wang Bing

Qing selections of Qing poetry are not only numerous but also vary in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ections' typology and thei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we can divide Qing selections of Qing poetry into four phases: the initial phase, the prospering phase, the transitional phase, and the summation phase. Classifying Qing selections of Qing poetry into different periods will highligh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phases, enable us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Qing selections of Qing poetry, and further our scholarly research.

關鍵詞：清代清詩選本 選本分期 選本特徵 批評意識

Keywords: Qing selections of Qing poetry, periodization of selec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selections, critical consciousness

